

第一章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任何一门学科，无论对于一个资深的研究者，还是对于刚刚涉足该领域的初探者，都必须明了它的研究对象，即工作领域，否则就无从进入角色，作深入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先要讨论这个问题。

民族社会学在我国是研究较少的一门学科，或更确切地讲，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这种状况与解放后社会学在我国的历史遭遇有关，因此，在没有转入正式讨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民族社会学的任务之前，有必要对于我国社会学的这段历史以及学科的现状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今天我们许多人对于民族社会学的提法感到生疏，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认为它是民族学的别称。这种状况表明，大家对于这门学科还不了解，而在不了解的背后，反映的正是目前这门学科还不发达的这个事实。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族社会学是至关重要的一门学科，而如此重要的一门学科，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原因何在？本节试图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

大家知道，社会学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早在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社会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由欧洲传到了我国。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的《群学肄言》一书，是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87)一书最早的中译本。由于“社会学”一词在当时汉语词汇中尚未通用，所以严复使用“群学”这个名称表述社会学这个概念，直到后来社会学一词才逐步普及开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

严复《群学肄言》一书的出版，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社会学的开端。不过社会学这个舶来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传播面很窄，只局限于知识界很小的圈子里。从作为一门学科来看，主要是在教会学校里讲授，如燕京、清华、辅仁等这样一些大学，并大都由美国或欧洲传教士执教。

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在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学成回国，部分人留在原派出的教会学校工作，有的来到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讲授社会学，或着手筹办社会学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注意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可以认为，由此开始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

他们当中有的人深入到农村，有的人深入到城市，有的人下到民族地区，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其中不少佳作就是在此过程中写出来的，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这些著作，对了解当时中国农村和城市，对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作品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的经典，同时也是世界社会学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欧美社会学界广为流传，颇有影响。

经过中国社会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到40年代末，在二十余所大学里设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开出的课程有四、五十门之多，在校的学生超过五、六百人。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学在

这个时期里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也可以说是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无疑，也是我国社会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也不要误以为社会学在解放前受到官方重视和青睐，比如，国民党政府就不允许在大学里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二、解放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经历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我国解放以后，经过三年的恢复，从 1953 年起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同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这一革命性的历史变革，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文化教育事业，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1952 年前后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的文科科系的调整，就是适应这场革命形势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在这次院校文科科系调整中，原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社会学系被停办。在这些学校工作的社会学专家学者，一部分人调到中央劳动干校，一部分人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另外一部分人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即更名后的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学者有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陈永龄先生、宋蜀华先生和沈家驹先生，稍后来民院的有吴泽霖先生，再后，50 年代初期到中央民族学院来工作的还有吴文藻先生。在此之前，他是国民党政府派驻日本使馆的文化官员。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女士弃暗投明，毅然回到祖国大陆，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报效人民。李景汉、陈达、袁方等人被分到中央劳动干校。吴景超、赵承信等社会学家首批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稍后李景汉先生也从中央劳动干校转到中国人民大学。陈达先生和袁方先生一直留在中央劳动干校，即易名后的现在北京经济学院。雷洁琼先生到北京政法干校工作，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应当说，当时进行这项工作时，在对这批学者专家的工作安

排上，注意考虑了他们原来的教学和研究方向。从人尽其才或从统战工作的角度，对其中在社会上比较活跃、又比较有名望的学者，如费孝通先生，还委以重任，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对调到中央民院来的其他学者也根据他们的志愿进行了妥善安置，学校成立了专门研究部和相关民族研究室，使学者们能够继续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民族学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学有专长的李景汉先生，考虑到解放前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并卓有建树，还专门成立了直属校部的社会调查研究室，由他担任室主任，领导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吴景超先生和赵承信先生也分别安排在当时的计统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和统计教研室，与他们原来从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向大体一致。当然，完全从事原来的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学专业已被停办。

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来的专家，完全从事民族学学科教学也是已经不可能，因为民族学专业也被停办。不过，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这批学者，并没有失去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机会，因为从 50 年代初期开始的民族识别活动，使他们有机会深入到广阔的民族地区开展调查活动。这可谓有失有得，失去了学校的小课堂，得到了进入民族地区研究的社会大课堂。民族识别活动，为我国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机会与实践，为日后开展民族学教学和民族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但无论怎样讲，停办乃至最后完全取消社会学和民族学这两门学科是大家所不希望的。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整体的利益或全局的考虑，暂时牺牲局部的情况也是有的。也就是说，为了使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集中人力、物力 and 财力，办好一批重点学科和专业是无可非议的。不过问题在于，作这种抉择的时候，应当从实际出发，选准对象，应

当从有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长远目标着眼才是全面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经济落后、社会问题复杂的多民族国家里，社会学这门学科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随便取消。民族学也是一样，也不可以随意砍去。因为这两门学科在开展社会调查和进行民族问题研究方面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对于我国制定重大方针政策能够提供咨询和建议，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取消如此重要的学科，确实令人痛心，使许多长期从事社会学工作和民族学研究的人感到不可理解。

应当指出，在 50 年代初期取消社会学的时候，并没有对它进行公开点名或批判。当然在理论界内部对于社会学已有定论，那就是认定它是一门资产阶级学科。由于这个时候，没有公开对社会学进行批判，所以，一些学者对于恢复社会学还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们始终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益于社会的学科，可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是到了 1957 年“反右”开始以后，已经很明显，社会学恢复已经是不可能，因为对社会学已经进行公开批判，并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和反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被戴上了这样的政治帽子，可想而知，要想再恢复它谈何容易。人们还亲眼看到，那些要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的人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至此，通向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路已被堵死，社会学成为无人再敢问津的禁区。

几十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现在冷静下来回顾这段历史，耐人寻味。当时人们对于社会学的认识如此片面，对于社会学的批判也有失公允。在批判者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和论据是：社会学不是出于马克思之口，而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最先提出来的。其次，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一门反动的学科，并进行过批判。加上 57 年那种特定的政治形势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社会学被打入了冷宫，是完全合乎逻辑和可以预料的事情。民族学作为社会学的

近邻和姊妹学科，自然也受到了株连。不过，民族学的处境要比社会学好一些，因为没有被公开点名和批判。

谁曾想到 57 年“反右”过后不到十年又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浩劫中，社会学的旧帐重提，又被折腾得不亦乐乎。这批学者中相当多的人为搞社会学吃尽了苦头，倍受冤枉。所有这一切，使后人对于这门学科已是望而却步，有谁还敢再搞社会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会学作为贯通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自然不可能被提上发展日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民族社会学在解放后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吧。

三、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以来，我国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内实行改革，首先是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在城市开始了经济改革试点，举国上下一片生机。在对外方面，大开国门，引进外资，实行开放。在思想政治领域，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肃清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思想，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于 1979 年 8 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文中提出了社会学、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在小平同志亲切关怀下，社会学得到了正名，从此开始了社会学恢复的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召开了来自全国部分省市过去曾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向与会者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这

一重要指示。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他指出，无论怎样讲，采用粗暴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宣布取消一门学科，禁止其存在和发展，这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是不对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同志也到会讲了话。在此期间，费孝通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遵照中央委员胡乔木同志的指示，召开了在京的部分老社会学家的座谈会。与会同志听到了为社会学平反的消息，激动不已，也有人开始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到会的老同志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 1957 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冲击或伤害，风风雨雨几十年，所以当他们听到党中央重新肯定了社会学，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为社会学正名，这同时也意味着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对他们过去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这确实是令人高兴和难忘的时刻。从此翻开了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新的一页，进入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时期。

如果从 1979 年春算起，到现在整整过去了 15 个年头。在这 15 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发展。这里不妨向刚刚涉足该领域的读者简单回顾一下对学科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

当时费孝通先生受命负责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筹备工作。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接着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先生任会长，王康先生任总干事即秘书长。工作千头万绪，到底该从何处入手？显然，摆在第一位的问题是青黄不接，缺少搞社会学的人才。过去搞社会学的一辈已经年迈，力不从心，不能担当此任，而年轻的同志又没有，怎么办？只有自己动手培养。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学会挑起了这副重担，开始了中青年社会学骨干的培训工作。

1980 年和 1981 年暑期，连续两年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社会学讲习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每期 50 余人，他们大都是一些热心社会学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其中以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居多。

这也恰好反映了中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恢复这门学科的兴趣和热情。笔者也是这两期讲习班的积极参加者和热心的学员。

给学习班上课的教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而主讲人是以美籍华人杨庆堃先生为首的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几名社会学教授。此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几名高级讲师、社会学博士。他们为讲习班开出了一系列的课程，其中主要的有：“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统计”，“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统计学”，“社区研究”，“社会学与现代化”，“文化人类学”，“高级统计学”等。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也分别讲授和介绍了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状况，以及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

每期讲习班的时间不算很长，一般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然而通过这样一段紧张集中的学习过后，大家普遍感到有很大的收获。培训过后的这百十来名学员就象一批种子把社会学的知识带到全国各地。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早已成为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在该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通过办讲习班，培养了重建社会学的急需人才。然而在十亿多人口的大国里，要使社会学能够在中国逐步得到普及不通过正规办学招收学生是不行的，而要办学就必须有教材。于是在 1980 年第一学期讲习班过后，费孝通先生就开始着手组织编写教材工作。从当时参加讲习班的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分校等单位，抽调了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几经修改和讨论，听取意见，最终于 1982 年写出了定稿。后又经费孝通先生修改和审定，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 1984 年 5 月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取名为《社会学概论》（试讲本）。这就是社会学恢复以后，同时也是我国解放以后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社会学教材。笔者作为编写组的一名成员，亲自参加和经历了这一过程。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于 1981 年初，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举办了

社会学专修班。该班的 40 余名学员，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有的回到原单位从事社会学教学，有的则留在南开大学转到社会学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在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后来陆续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一批重点大学办起了社会学系或专业。现在这些学校不仅招收本科生，而且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有的大学，如北京大学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到目前为止，全国差不多有十七八、近二十来所高等院校设有社会学系或专业，由此可见社会学在我国 15 年来的迅速发展。

现在社会学不仅在大学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国家和各省市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成为社会科学大家族里的重 要一员。

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各省市还建立了社会学学会组织，大量发展会员，为社会学的普及和提高作了许多工作。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发起并组织的社会学函授大学，在普及社会学知识、扩大社会学影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辽宁省社会学学会也举办了类似的函授教育。一时间在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一股学习社会学“热”。这也充分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深得人心，为社会人们所欢迎。

在社会学普及和提高方面，社会学的各种刊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公开出版有《社会学研究》杂志，内部发行的有《国外社会学》杂志；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公开出版的会刊是《社会学与社会调查》；辽宁出版有《中国社会问题》；上海出版有《社会》。至于内部通讯性质的社会学刊物也还有许多。

在此期间，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其中以各种各样的教材为最多。除了社会学概论这类的书以外，有社会学史方面的，如中国社会学史，外国社会学史，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

等。同时还出版了大量分科社会学著作：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婚姻社会学、法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文学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交通社会学、旅游社会学，等等。当然，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是我们自己写的，有的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然而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表明社会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势头，

10 余年来，社会学工作者不仅在教学方面，而且在科研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例。他的研究成果对制定我国农村政策和城市规划，乃至制定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大都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对做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受到普遍的好评。

随着社会学的恢复，民族学也获得了的新生。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民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1983 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学系，去年刚刚庆祝了建系十周年。在此期间，民族学在中央民族大学和其他民族院校，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他们对维护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对当前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学和民族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是同命运，共患难，今天则是双喜临门，同庆发展。

四、问题与思考

社会学在我国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之”字之路，历经曲折，最后得到肯定，恢复了作为学科应有的地位。社会学在我国遭受的挫折和不幸，本身是一件坏事，同时又是一件好事，这当中不乏给人以启示和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

如果从 1952 年算起，到 1979 年宣布恢复这门学科为止，中

间时隔 27 年。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可是对于一门学科来讲，莫非说几十年，就是几年不发展，也会带来巨大损失。我国有一句俗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科学突飞猛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当今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别说不进则退，就是进步得慢都意味着退步，都有可能被淘汰。这就是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对我国社会学“停办”或曰“中断”感到痛心，对于失去的时间感到惋惜。

国外社会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而且在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方面，都作出了成绩。社会学家在制定社会政策，讨论社会发展规划，特别是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参与能力，被誉为决策部门的好参谋，实际工作部门的好帮手。

比如说，国外一些大的企事业单位，通常都设有社会学工作者的岗位，负责社会市场调查，了解用户对产品的意见和反映，从而提高商品的竞争力。社会学工作者还在企业形象设计，调节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企业管理，公共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是从一个企事业小范围内讲。如果从更大的范围上看，社会学调查研究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方面也颇有建树。

比如说，60 年代的美国社会，阶级斗争尖锐，种族冲突激烈。当时在美国的中小学里，黑人的孩子不能同白人的孩子一起读书，种族歧视严重。类似的这样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和做法，加剧了种族间的隔阂，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指出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分校学习的弊端，提出改革分校制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以上举例仅说明社会学在社会实际应用方面所起的作用。当然社会学发挥作用的地方并不局限于此。社会学在我国几十年的中断，使这门学科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学科自身建设方面，又表现在社会实际应用方面。对于前者的影响

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后者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我国人口问题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子。

我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并阐明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土资源条件相适应，甚至还提出了我国最佳人口数量和最大人口负荷指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听取这些科学的意见和建议，反而把以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为代表的正确观点作为“新马尔萨斯”理论进行了批判，致使我国人口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误批一人，多生三亿”这句话的来由。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然而这是指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看问题，而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会立刻表现出这种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人口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社会学在此期间已被禁止，没有可能再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所以关于人口问题的失误已不可能很快得到克服和纠正。以上举例仅说明社会学中断对我国社会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而社会学的中断和被否定又是由于对社会学的片面认识所致。对于社会学的这种片面认识，不仅在中国存在，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有过。问题是如何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今后在其他类似的问题上再犯类似的错误，再走弯路。特别是在对于一些学术性的问题上，应当谨慎从事，应当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应轻易地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上纲上线、甚至乱扣政治大帽子，这样做不利于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学科的发展。

庆幸的是，这样的历史早已经成为过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及时恢复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并在短期内有了较快的发展。自从 1979 年社会学在我国重新恢复以来，不仅在一般社会学

理论方面，而且在分科社会学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当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象民族社会学这样重要的学科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这里主要不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原因，而是与学者们对于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有关。在下面几节里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节 民族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

民族社会学是由民族学家最先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民族社会学的提出和发展，表明民族学家对于社会研究的关注。民族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民族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它们又是相互区别的两门学科。

一、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联系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讲，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关系密切的两门学科。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在1930年5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曾经指出“民族学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他从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上阐明了这一点。他说：“社会学的对象，自然是现代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必要知道它所以成为这样的经过；一步步的推上去，就要到最简单的形式上去，就是推到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然而文明人的历史，对于未开化的时代社会状况，记得不很详细。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所得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这就是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的一点。”^①

《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422页。

这就是说，在蔡元培先生看来，民族学和社会学所研究的，都是面对人类社会：社会学面向发达社会，即通常简称为现代社会；而民族学研究现时代还处于不发达状态下的未开化民族或部落，所得材料提供给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所用。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从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和民族学为社会学提供资料的角度而说的。

除此之外，社会学研究，还可以为民族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历史上有人把它们看作是一门学科。

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以及他的追随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在做研究的时候，都是把民族学和社会学两者密切结合起来，把它们看作是一门学科的两个部分，而不是把它们截然分开。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是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因此称为理论民族学，而民族学研究是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具体资料，作为理论研究的佐证。实际上这也表明，杜尔克姆和莫斯都注意到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

杜尔克姆和莫斯关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这种观点，是与他们本身的经历和学术研究活动有关，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大家知道，杜尔克姆在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民族学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一生中著述颇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论自杀》（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在他死后还出版了一本《法兰西教育学的发展》（1938）。西方社会学正是在杜尔克姆的努力下，使其变成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他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概念，并身体力行，使社会学研究具体化，成为可以操作的一门学科。其中，《论自杀》一书就是他的这一思想

的具体体现。

杜尔克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是他在对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及爱斯基摩人部落考察和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一部民族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力作。他在书中提出“神圣”、“图腾”等一些重要概念，试图对宗教的本质和现代社会作出科学解释。杜尔克姆的这部论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推崇，正是由于他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结合，认为民族学和社会学是一门学科的结果。

莫斯在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给后人留下的著述不是很多，主要有《民族学概论》（1947）与《社会学和人类学》（1950）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他在巴黎民族学所讲授民族学调查方法课的记录整理稿，第二本书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和朋友帮助选编整理的在 1904—1938 年期间 he 发表的论文集。后来由喀拉狄（V. Karady）于 1960 年编辑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莫斯文集》。

作为杜尔克姆的外甥和学术上的追随者莫斯，积极协助他的舅父进行学术著作的编写，如《论自杀》，就有他的辛勤劳动。他还协助杜尔克姆编辑《社会学年刊》，该刊是杜尔克姆于 1896 年创办的。到 1912 年，一共出刊 12 卷，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专题性的学术论文，另外一部分是对民族学和民俗学一类新书的评价和分析。杜尔克姆死后自 1925 年起莫斯出任该刊的主编，编辑出版了两卷。自 1934 年起《社会学年刊》改名为《社会学年报》。这个时候的《社会学年报》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分为普通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形态学五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停刊，后来又复刊并恢复原来的名称，但境况已大不如前。

莫斯在民族学研究中十分重视民族理论和调查研究方法。他对交换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比较，颇有创意和发现。

他在《论赠与》（1925）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在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北美洲西北部等地土著民族中存在的交换形式，对赠与、受礼及报偿作了分析，并对这些行为所表征的意义，从宗教、伦理、经济、乃至神话诸方面作了说明和解释，他还对巫术、丧葬礼仪、自我观念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探讨。他在民族学调查方法方面的观点，对后人也有启发。在社会学方面，他的思想与杜尔克姆相一致，也把社会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莫斯看来，通常所说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宗教现象等，均是人为分割造成的，实际上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然而在做研究时，对于社会现象作某种划分又是必要的。

莫斯的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他不仅对学术有多方面的爱好，而且对于政治也很感兴趣，当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杜尔克姆和莫斯都是造诣很深、辛勤耕耘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两个领域里的学者，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学和社会学是相互贯通、相互为用的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堃教授在谈到解放前我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解放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的。清华大学最初设有社会学系，后来又叫作社会学系，最后改为社会学系，但没有普通人类学一门基础课。”^①“解放后，社会学和民族学几度被取消，直到最近几年才又恢复起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 30 年来，我们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需要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调查研究。必须先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弄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发现其规律，然后才能制定正确的解决办法。这些社会问题，如人口普查问题、青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少年犯罪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都市污染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等，均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围。^①

事实上，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有时确实难于完全分开。先就民族学来说，现在的许多民族学工作者，都面对着本国民族、特别是非主体民族以及尚处在未开化状态的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不可能脱离对现代文明社会的研究和比较。而要了解现代文明社会，自然离不开以现代社会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知识。而社会学工作者在研究现代文明社会时，也不可能不对现代社会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就需要民族学知识。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两门学科的密切关系。

二、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区别

民族学和社会学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两门学科。首先它们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完全一样，各有其侧重，也就是说，在它们研究的具体内容上，以及研究的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从研究的对象上看，民族学首先关心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尚处在相对落后状态下的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这一点在我国民族学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

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在民族学研究中，主要针对的是除了我国汉族以外的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早在解放初期，我国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到我国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民族识别活动中，他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即令是在民族学与社会学被取消的时候，也没有影响他们对于民族研究工作的热情和兴趣。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学和民族学重新得到肯定和恢复。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谈到，社会学恢复以后，许多大学里设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各省市和中央一级的社会科学院系统，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